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第十六卷 林园散论（下）

#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第十六卷

林园散论（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林园散论（下）

赵遐秋 曾庆瑞 著

## 《林园散论》（下）目录

赵遐秋/曾庆瑞（犁剑墨） 语言文学自修大学教材《中国现代文学》部分讲稿	(1)
第九讲 左联时期的重要作家（下）	(1)
第一节 丁玲、萧军、萧红等的小说	(1)
第二节 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与诗作	(11)
第三节 洪深、田汉的戏剧文学	(19)
第四节 杂文、小品和报告文学	(27)
第十九讲 国统区文艺	(33)
第一节 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	(33)
第三节 国统区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创作	(43)
曾庆瑞/赵遐秋 《语文学习讲座》部分讲座稿	(59)
闻一多和他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59)
《闻一多先生传》简析	(76)
曾庆瑞 “新诗话”——一个蝴蝶怕孤单	(82)
赵遐秋 《文坛纷争话春秋》专栏	(86)
“文学革命”，旅美胡适孤身迎战群儒	(86)
“文学革命”，钱玄同刘半农串演“双簧”	(89)
“林蔡之争”，白话取代文言大势所趋	(93)
“学衡”、“甲寅”，文言白话之争再卷风云	(96)
《小说月报》，文研会鸳鸯派争夺阵地	(99)
笔战三年，文研会创造社初结宿怨	(102)
爱，还是憎？冰心的《超人》触发了争论	(104)

2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第十六卷）

“泪浪滔滔”，郭沫若、徐志摩积怨难消（上）	（106）
“泪浪滔滔”，郭沫若、徐志摩积怨难消（下）	（110）
“脱离新月”，胡适给徐志摩最后通牒	（113）
欢迎？批评？泰戈尔访华招八面来风（上）	（116）
欢迎？批评？泰戈尔访华招八面来风（下）	（119）
“无音的乐”，鲁迅刘半农讥评徐志摩	（122）
“广州事件”，创造社诸元老分道扬镳	（126）
赵遐秋 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之《达夫往事》3篇	（130）
想将一丝一丝的日光捉起来	（130）
“我愿意去砍柴”	（131）
在京华尘土里相遇	（132）
赵遐秋（张安阳） 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之《志摩轶事》18篇	（134）
儿童时代的老师——老佣人家麟	（134）
郁达夫眼里的徐志摩	（135）
徐志摩在《诗镌》说大话	（136）
拜梁启超为师	（137）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通告	（138）
英伦热恋林徽因	（140）
康河畔迎着落日跪下	（142）
鼓动小曼私奔	（143）
痴情追随罗素	（144）
在梁启超的训斥下完婚	（145）
拜访威尔斯	（146）
泰戈尔与徐志摩的忘年之交	（148）
与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的特殊友谊	（149）
失败的演讲	（151）
新加坡举报贩毒案	（152）
登庐山作石工歌	（153）
热孝里的风波	（154）
“新月派”一颗巨星陨落	（154）
曾庆瑞 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之《大陆文艺窗》专栏	（157）
白鹿原上民族魂	（157）

笑骂评说在废都	(159)
翰英街头说京都	(161)
江山美人系明皇	(164)
花都巴黎人生梦	(166)
不堪回首知青梦	(168)
悲歌一曲“后知青”	(170)
电视节目要市场	(173)
角色明星竞选赛	(175)
《霸王别姬》红京城	(178)
心境告白说命运	(180)
丝路情歌驼铃唱	(182)
曾庆瑞 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之《大陆文坛传真》专栏	(185)
半楼移民混北京	(185)
民谣巧断官场病	(187)
八里古镇说人伦	(191)
黄土高原说情韵	(193)
骚人笔下有骚土	(195)
曾庆瑞 1991年秋在日本大学艺术学部讲学的四次演讲辞	(199)
中国现代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	(199)
80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	(216)
80年代的中国话剧文学	(227)
中国电视剧的文学名著改编艺术	(234)
曾庆瑞/赵遐秋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缘起	(246)
曾庆瑞/赵遐秋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心随山水》卷 “卷首絮语”	(249)
曾庆瑞/赵遐秋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心随山水》卷 文选“点评”	(251)
李大钊《五峰游记》点评	(251)
冰心《海上》点评	(252)
徐志摩《泰山日出》点评	(253)
朱自清《温州的踪迹·二 绿》点评	(254)
倪贻德《秦淮暮雨·红叶》点评	(255)
俞平伯《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点评	(256)

孙福熙《归航 地中海上的日出》点评	(257)
徐祖正《山中札记·九》点评	(258)
谢冰莹《爱晚亭》点评	(259)
王世颖《放生日的东湖》点评	(260)
苏雪林《溪水》点评	(260)
钟敬文《西湖的雪景》点评	(261)
郁达夫《钓台的春昼》点评	(262)
陈衡哲《再游北戴河》点评	(264)
巴 金《鸟的天堂》点评	(264)
夏丏尊《白马湖之冬》点评	(265)
许地山《上景山》点评	(266)
王鲁彦《听潮的故事》点评	(267)
朱 湘《江行的晨暮》点评	(268)
赵景深《西溪》点评	(268)
黎烈文《湖上》点评	(269)
李金发《在玄武湖畔》点评	(270)
陈子展《观潮》点评	(271)
沈从文《桃园与沅州》点评	(271)
柯 灵《野渡》点评	(272)
刘大杰《巴东三峡》点评	(273)
叶圣陶《记游洞庭西山》点评	(274)
蒋牧良《龙山》点评	(274)
李广田《扇子崖》点评	(275)
丽 尼《渡头》点评	(276)
戴平万《上海》点评	(277)
丰子恺《山中避雨》点评	(278)
老 舍《趵突泉的欣赏》点评	(278)
蹇先艾《濠渡》点评	(279)
何家槐《绝境》点评	(280)
茅 盾《风景谈》点评	(280)
赵遐秋 《新文学鉴赏文库·散文卷》部分篇章鉴赏	(282)
忠实地描写人生的经验	(282)
从单纯的信仰流入怀疑	(285)

“人是自然的产儿”	(288)
报告文学趋向成熟的标志	(292)
曾庆瑞(犁剑墨)《中外小说大辞典》巴金小说部分篇目释文	(297)
《灭亡》释文	(297)
《新生》释文	(298)
《死去的太阳》释文	(299)
《爱情的三部曲》(《雾》、《雨》、《雷》、《电》)释文	(299)
《海底梦》释文	(302)
《春天里的秋天》释文	(303)
《砂丁》释文	(303)
《雪》释文	(304)
《利娜》释文	(305)
《火》释文	(305)
《憩园》释文	(306)
《寒夜》释文	(307)
《第四病室》释文	(308)
《复仇》释文	(308)
《光明》释文	(309)
《电椅》释文	(309)
《抹布》释文	(310)
《将军》释文	(310)
《沉默》释文	(311)
《神·鬼·人》释文	(311)
《沉落》释文	(312)
《发的故事》释文	(312)
《长生塔》释文	(313)
《雷》释文	(313)
《还魂草》释文	(314)
《小人小事》释文	(314)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释文	(315)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2集)释文	(315)
《巴金短篇小说集》(第3集)释文	(315)

## 6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第十六卷）

赵遐秋	《中外名诗赏析大典》名诗 10 首赏析	(317)
	徐志摩《雪花的快乐》赏析	(317)
	徐志摩《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赏析	(318)
	徐志摩《沪杭车中》赏析	(319)
	徐志摩《自然与人生》赏析	(320)
	徐志摩《偶然》赏析	(321)
	徐志摩《苏苏》赏析	(322)
	徐志摩《再别康桥》赏析	(322)
	徐志摩《黄鹂》赏析	(324)
	鲁 蓉《红的雪花》赏析	(325)
	鲁 蓉《泥土》赏析	(325)
赵遐秋	走出认同的危机	
	——我看海外华文文学的认同问题	(327)
赵遐秋	两个名称 一大分歧	
	——为“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一辩（《海外华文文学综论·代序》）	(330)
赵遐秋	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深入	
	——欧阳子的小说世界（《海外华文文学综论》下篇之一）	(340)
赵遐秋	《海外华文文学综论》后记	(352)
曾庆瑞	书卷多情似故人	
	——北美华文作家散文的思乡情结	(353)
赵遐秋	我看澳门文学的文体格局	(358)
赵遐秋	写作，给妈妈看	
	——我读宋晓亮的小说	(360)
赵遐秋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余国英小说集》代序	(364)
赵遐秋	寻梦到诗国	
	——读江天先生诗集《土地的呐喊》	(367)
曾庆瑞	《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1917—1988）》目录	(378)
曾庆瑞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1917—1988）》书稿的若干问题的说明（1988 年 8 月 24 日）	(389)
曾庆瑞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目录	(395)

- 曾庆瑞 “序幕”和“正剧”之间的企盼  
——对《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二卷的编写  
进一言 ..... (398)
- 曾庆瑞 《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选题策划案（草稿） ..... (403)
- 曾庆瑞 关于组织编著、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  
丛书》的总体设想（草案）（1986年1月20日） ..... (404)
- 曾庆瑞 关于编辑出版《海外华文文学丛书》、《海外华文文学  
研究资料汇编》、《海外华文文学家评传丛书》、《海外  
华文文学史丛书》的总体设想（1987年4月10日） ..... (408)
- 曾庆瑞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缘起 ..... (413)
- 曾庆瑞 《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征稿信 ..... (416)

# 语言文学自修大学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部分讲稿

赵遐秋 曾庆瑞（犁剑墨）

## 第九讲 左联时期的重要作家（下）

赵遐秋

### 第一节 丁玲、萧军、萧红等的小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是左翼十年时期对中长篇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一位女作家。

丁玲原名蒋冰之、丁冰之，1904年出生在湖南临澧一个官僚地主之家。她幼年丧父，寡母是个小学教员。母亲的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教育、熏陶了她，培养了她的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后来，丁玲又接受了“五四”运动影响。早年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来进了长沙周南及岳云中学。1922年，丁玲到上海进了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第二年又进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不久，到了北京。1924年，她在北京与胡也频相识，其后又结为伴侣。这时，她虽然也在极力追求人生的光明之路，但远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又难免“沾染上了伤感与虚无”，思想十分混乱。丁玲后来回忆说，那时虽然“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曾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丁玲受到很大的刺激。她所熟知的人中，有的牺牲了，有的动摇了。革命的落潮使丁玲的思想陷入了极端的痛苦之中。四处碰壁的遭遇，使她拿起笔来，从1927年开始创

作小说，揭露社会的黑暗，抒写对人生的愤怒和鄙视。

丁玲的处女作《梦珂》。紧接着《梦珂》问世的是引人注目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个时期的十多篇短篇小说，收在《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性》等三个集子里。1929年，丁玲发表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另一中篇《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也跟读者见面了。1931年，著名的中篇小说《水》问世。1933年，《水》的续篇《奔》出版。其间，丁玲还写有中篇《母亲》以及《法网》等其他作品。

《韦护》之前，丁玲小说的主要题材是大革命后的青年女子的精神苦闷。《梦珂》写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女学生梦珂，愤激于红鼻子教员对模特儿的侮辱，被迫离开学校。后来，在姑母家，无法忍受表兄等人感情上的欺骗，又被迫出走，被冷酷的社会逼得去当了一个剧社的演员，遭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更大的凌辱。梦珂终于从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学生，渐渐变成了一个见怪不怪的影星。作品对梦珂寄寓着深厚的同情，也通过梦珂的变化，控诉了黑暗社会是一个罪恶的深渊。

《在暑假中》、《小火轮上》也是写的这类题材。前者写一群小城镇上的小学女教师在停滞闭塞生活的窒息下，慢慢地消融着她们青春的活力。有的从“同性恋爱”中寻找麻醉，有的则以“独身主义”来与命运抗衡。后者描述了一个被轻薄男子侮辱欺骗，又被学校辞退的女教员的悲哀。

从这一时期的作品来看，丁玲创作的主要倾向，正如她自己所说，是“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见《跨到新时代来》）。《莎菲女士的日记》可以说是这一倾向最突出的表现。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篇日记体裁的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记述了一个受“五四”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女性，对社会的不满和精神上的苦闷与绝望。作者没有在她如何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和反抗封建婚姻上大作文章，而着重刻画她那种封建礼教叛逆者的性格。她身患肺病，独居公寓，对封建家庭毫不眷恋，只身走上社会，寻求幸福与自由。她蔑视一切习俗，敢于向旧礼教宣战；她要求个性解放，过热烈而痛快的生活；她为人善良而正直，鄙视庸俗与丑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她所接触到的都是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的人。她孤傲矜持、愤世嫉俗，厌恶周围的陋习和生活，然而她得到的却是欺骗和冷落。这种特殊的生活环

境造成了莎菲十分矛盾而复杂的思想性格。比如，她要求别人了解她、关心她、爱她、忠实于她，而她却对人骄纵任性，感情十分随便。用她自己的话说，“朋友好，便好；合不来时，给别人点苦头吃”。她渴望和追求着真正的爱情，可她又处处流露出虚无思想，常“怀疑到世人的爱”。她不爱苦苦追求她的苇弟，觉得他毫无男子气概，只知道把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到她手背上，却又需要他来安慰自己的寂寞；她享受着苇弟的爱慕，然而又恶意捉弄他、折磨他，以从中得到一些乐趣。但事后她又感到对苇弟的“抱歉”、“惭愧”、“罪过”，谴责自己是一个“不配承受苇弟真挚的爱的女人”。她鄙视凌吉土卑劣的灵魂，一眼就看透了这个只知从女人身上寻找“一时的肉感的享受”的南洋小开，以至于决心让他尝一尝自己的“不柔顺、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弄”。可又为他的“丰仪”倾倒，甚至不择手段想占有他。为此她又时时懊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认为这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不出来的”，而诅咒自己的堕落。当她达到目的以后，又由于悔恨而“陷入到极深的悲境里去”，最后只好孑然出走，决计到无人认识的地方，去度过生命的剩余。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运用独具特色的语言，大胆剖露人物细腻的思绪，用各种不同的人物烘托主人公奔放的行动，将莎菲这个人物复杂矛盾的性格刻画得精微细致，惟妙惟肖，赢得了不少读者，震动了文坛，但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热烈地称颂，有人严厉地批评。其实，莎菲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性格，是要从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的。

《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这正是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年仅19岁的莎菲，冲破封建家庭的羁绊来到“五四”发源地北京。“五四”新思想的余波还在激荡着这个少女的心。不过，她涉世尚浅，没有什么人生的经验，更不了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当黑暗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她朦胧美好的幻想时，她才知道迎接她的社会竟然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大樊笼，并且终于明白了“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许任我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是于人并不损害的事”。她不甘心听任环境的摆布，社会的压迫反而更加滋生了她的反叛情绪，这如同病魔想夺走她的生命，而她求生的欲望更加强烈一样。于是，心灵上的创伤使她不时发出“生是乏味的，生不如死”的痛苦叫喊，她的叛逆逐渐陷入一种对黑暗现实不满的变态的发泄及报复。这便是莎菲性格的核心，是她种种复杂矛盾表现的根源。她虽然不会向黑暗社会屈

服，那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意识也决定了她不可能投身人民的革命事业并在其中获得新生。莎菲的结局只能是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悄悄地活下去”。

继《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丁玲小说所塑造的人物也多是被时代唤醒但又找不到出路的女性，只不过类型有所不同罢了。《她走后》中的丽娴，《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的薇底，《庆云里一间小房里》的阿英，《自杀日记》中的伊萨，《阿毛姑娘》中的阿毛，等等，有的堕入了享乐主义的泥坑，有的追求不正当的性生活，有的则成了厌世者。作家通过这些人物病态生活的描绘，展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女性的可悲命运，揭露了黑暗社会的罪恶。由于她们只是做一种没有出路的挣扎，也使作品流露出较浓厚的虚无主义气息。

显然，梦珂、莎菲等人的叛逆、追求、幻灭、绝望的经历，同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密切相关。由于当时生活和思想的局限，丁玲不可能替她的一个个的主人翁找到出路，这一时期的作品就呈现出感伤、灰暗的色彩，带有颓丧、消极的情调了。

丁玲毕竟是一个不断追求、努力进取的作家，她的创作并没有停留在已有的水平上。稍后的作品《日》和《野草》已经显露出作家开始摆脱感伤情调和虚无思想的趋向。《日》中的伊赛不满虚无主义者对革命的嘲弄，想尽办法，很快找到了出路，开始新的生活。《野草》中的女主人翁已清除了莎菲的变态心理，而用辛勤的创作来表示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1928年丁玲和胡也频到上海后，直接参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世界观得到改造，创作中进步的倾向大大增强了。中篇小说《韦护》和《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的发表，显示了丁玲在创作中“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

这些作品开始描写革命斗争并同情和歌颂革命者。如《韦护》写留苏青年韦护爱上了少女丽嘉，并沉醉在爱情之中。当他意识到恋爱同革命有矛盾时，便忍受痛苦，割舍爱情，奔赴广州干革命去了。丽嘉也决心振作起来，准备做一点事业。《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的美琳，在革命者的影响下开始觉醒。由于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态度不同，夫妇间发生了分歧，革命与恋爱冲突的结果，美琳弃家而参加工人运动。这里，作品的时代感比较鲜明了。有逐步扩展到写革命群众运动的趋向了。

《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明显的缺点，是当时流行的“革命

浪漫谛克的倾向”。丁玲自己也说，她那时“陷入了恋爱与革命的光赤（即蒋光慈）式阱里去了。”（《我的创作生活》）结果，人物以至于情节、结构等，都公式化了。

1930年，丁玲参加了“左联”，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1931年2月胡也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她更积极地投身革命工作。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左联文艺刊物《北斗》的主编、左联组织部长等职务。亲身参加革命实践，与工农群众的接触，使丁玲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前途，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政治思想的迅速进步，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导致了丁玲的创作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其标志，就是中篇小说《水》的问世。

《水》以1931年中国十六省的水灾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的痛苦。作品形象地描绘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图景和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在严重的水灾面前，事实让他们看得很清楚，盼官吏募捐筹款，等菩萨萌发慈悲，全是骗人的空话，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得救。于是他们迅速地组织起来，呼啸着奔向城里，与剥削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的主人公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遭受水灾的农民；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具有伟大力量的群众集体。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这队人，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了过去。”一改过去作品低沉压抑的氛围，丁玲使她的新作显露出高昂磅礴的气势。

《水》的发表表明，丁玲的目光，已经从狭窄的小资产阶级男女青年革命和恋爱的纠葛转向了广大农村、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农民的反抗斗争。题材变了，人物变了，“革命加恋爱”公式里表现出来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也消失了。文艺思想的转变，人物典型化法则的运用，都使丁玲的《水》列入了那时中长篇小说创作的新阶段。事实上，《水》的创作和成功不仅成了丁玲创作道路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是整个进步文坛转折的标志。冯雪峰说得好，这是“新的小说的诞生”，因为“作者采用了重大的巨大的现时的题材”“在现在的分析上，显示作家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同时，“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署名何丹仁）从此，反映农村斗争以及其他描写广阔社会生活的作品也就大量涌现出来了。

小说《奔》可以看作是《水》的续篇。《奔》是30年代的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的真实反映。丁玲对中国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正确理

解，使作品也能揭示农民必然走向革命的道理，而且还能把农民的觉醒同工人的斗争联系起来。中篇小说《法网》，写了两个工人家庭的不幸遭遇。作品提出了工人解放的正确道路的问题，批判了个人复仇主义的思想。在另一篇小说《消息》中，作者还通过一个对儿子的革命活动十分漠然的老太婆的转变，从侧面反映了工人运动的深入，构思精巧。另外《田家冲》和《一天》作了反映知识分子深入革命实际，与工农初步结合的尝试，虽然作者不适当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这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动向，它给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九·一八”事变之后，丁玲还表现了人民的反帝爱国怒潮，如《夜会》等作品。另外，《诗人亚洛夫》揭露白俄破坏罢工，《某夜》描写革命者英勇就义，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总之，自《水》以后，丁玲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艺术上，作家也克服了初期小说视野不开阔，社会背景不够清晰，人物形象单一的毛病，以人物的行动为中心开展故事，代替了冗长、静止的心理描写，使作品曲折起伏，引人入胜，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她的小说，无疑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国难当头，抗日的怒潮席卷全国。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左翼和进步的文学阵营为主，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开始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抒写国难，鼓动抗日。“东北作家群”就是在这时出现在文坛上的。他们杰出的代表是萧军，萧红以及舒群、端木蕻良、罗烽和白朗。

萧军本姓刘，学名鸿霖，后改名蔚天，笔名三郎、田军、萧军。1907年生于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祖父刘荣，是弹棉花工人兼佃农。父亲刘清廉是细木和镶玻璃工人，经营过小木器作坊、小商号，参加过抗日义勇军。1917年萧军随父亲到长春，在小学读书。1925年开始，他先后在东北的军队中当过骑兵，文书上士，两次进讲武堂学习。1930年他在毕业前夕，因替同学抱不平殴打了队长，结果被队长开除。“九·一八”事变后，曾与朋友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后逃至哈尔滨。1932年在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所领导的文学艺术活动。1933年与萧红在哈尔滨出版小说散文合集《跋涉》。1934年春在哈尔滨开始写《八月的乡村》，同年5月与萧红到山东青岛，任《青岛晨报》副刊编辑，继续写《八月的乡村》，1934年10月完成初稿。这时他开始与鲁迅通信，1934年11月和萧红

一起到上海与鲁迅会面。1935年在上海，在鲁迅指导下参加《海燕》、《作家》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就在这一年的6月，在鲁迅的主持下，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书》正式出版了。这个期间他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羊》、《江上》，小说散文集《十月十五日》、诗歌散文集《绿叶的故事》以及中篇小说《涓涓》。

小说散文集《跋涉》收有萧军的6篇短篇小说，即《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和《下等人》；及萧红的6篇作品。《桃色的线》、《烛心》和《孤雏》写于1932年，都是以失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歌颂了他们在贫困生活中挣扎的善良心灵和真挚的爱情。这三篇作品明显地有着作者的生活影子。由于局限于某些真人真事，因而在人物塑造和结构上难免有些粗糙。《这是常有的事》、《疯人》和《下等人》写于1933年，比前三篇有明显进步。作者的视野扩大了。开始跳出了个人生活的圈子，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以及自发的反抗成为作者笔下的中心内容，小说艺术技巧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跋涉》的出版，受到当时东北文坛的重视，许多刊物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评介，认为“从广漠的哈尔滨，它是一颗袭入全‘满’的霹雳”，<sup>①</sup> 1942年的《满洲文艺年鉴》还确认，“作者的创作程度决不是观念的虚构，与浪漫的幻想，而纯粹是在现实中提炼素材。作者的生活体验，是很丰富的吧，并且凭着他们前进的世界观，从他们笔下写出来的人物，都是一种下层的被毁辱和损害的人们生活奋斗的故事。”<sup>②</sup>

一开始就面向着生活的真实的萧军，是不满足于《跋涉》那样只从狭窄的都市里弄中去看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上层剥削者的罪恶的。他在《八月的乡村》里要展现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广阔图景了。

被誉为中国的《铁流》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的成名之作，也是30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坛的东北作家群的代表性作品。在《八月的乡村》中，作者怀着极大的悲愤，无比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这暴行，确如鲁迅所说，是“鲜红”的一片：

<sup>①</sup> 邓立：《萧军与萧红》，原载1937年沈阳《新青年》杂志，转引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1辑。

<sup>②</sup> 秋萤：《一九四〇年前的东北文艺情况》，见《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1辑。